

论 40 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

江胜清

(孝感学院 中文系,湖北 孝感 432100)

摘要: 文章着重论述 40 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潮出现的原因。文章认为,这一诗潮的出现,既是文学延续和党的文艺政策指导的必然结果,又是由接受对象的接受水平、审美情趣以及作家的素质决定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大量涌现。

关键词: 40 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075(2001)01-0042-04

20 世纪 40 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不断巩固、壮大,解放区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工农兵文学和暴露讽刺文学就成为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学的重要分野,它们竞相繁荣,共同构成了 40 年代波涛汹涌、蔚为壮观的文学主潮。

在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中,让评论家们津津乐道、让读者惊叹不已的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就是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兴起和大量涌现,这构成了 40 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奇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野女儿》《王九诉苦》《死不着》,田间的《戎冠秀》《赶车传》(第一部),李冰的《赵巧儿》,魏巍的《黎明风暴》,阮章竞的《圈套》《漳河水》……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之中尤以《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最负盛名,它们代表了 40 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最高成就。

民歌体叙事长诗是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中一道迷人的风景线,它可以是 40 年代解放区诗歌的惟一收获。由于共同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使得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里的诗必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1)“颂歌”(歌唱革命带来的新思想、新生活,歌唱革命政党、政权、领袖与军队)成为新诗的主要内容和体式。2)抒人民之情。抒发个人感情被

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由此导致了诗人主体的消失,诗人成为大众(阶级)的代言人,表现群体的思想感情。3)重视对群众斗争与劳动生活的如实描写和具体叙述,从而导致了抒情的放逐。4)追求语言的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大量采用口语、土语入诗,以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工农兵能听懂为标准。5)尽量吸收和借用民谣的形象原型、体式、表现手法、韵律和语言,追求自然、自由而又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效果,要求能谱曲吟唱。

为什么在 40 年代解放区会大量涌现民歌体叙事长诗?究竟是什么机制决定了 40 年代文学中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的出现?

从文学承接看,40 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大量出现,是“五四”以来新诗大众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新诗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思考、探讨新诗大众化问题,注意从民间汲取艺术资源。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发现了中国民间诗歌的传统,给《诗经》中的“国风”、汉魏乐府诗以极高的评价。早期白话诗人不但热心于民间歌谣的征集、整理,而且开始了“新诗歌谣化”的最初尝试,如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刘大白的《卖布谣》等都是其杰出代表。这种尝试在 30 年代中国诗歌会诗人那里就变成一种更为自觉的诗歌运动,并赋予其意识形

收稿日期: 2001-01-02

作者简介:江胜清(1966-),男,湖北孝感人,孝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

态的意义,从而成为 30年代左翼文艺主流中重要的分支。这之中以蒲风最为著名。蒲风是中国诗歌会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严格遵循中国诗歌会“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的主张,因而他的诗具有题材的尖锐性、主题的重大性和及时性等特点。蒲风还是 30年代新诗歌运动最热烈的倡导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他力求用明白晓畅的语言,甚至试图把俗言俚语融进作品,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从而在新诗的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对 40年代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崛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了 40年代的解放区,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文艺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伴随着文学政治功能的强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进步性和形式的通俗性就必然成为文学的首要选择,“诗的歌谣化”发展到了极致,而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大量涌现,正是中国大众化新诗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

从文艺政策看,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大量涌现,是党的文艺政策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指导的直接产物。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谈及“文艺为什么人”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由此确立了解放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而《讲话》一直是 40年代解放区执政党制定文艺政策的根本方针和指导文艺运动的明灯。因此,《讲话》内在决定了 40年代解放区诗歌的“工农兵方向”。

在谈及“如何为群众”时,毛泽东认为这不只是一般写作形式、方法上的问题,而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的政治立场如何转变、思想感情如何朝工农兵靠拢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和思想情感改造的问题。因此,他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

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2年 12月,陕甘宁文艺界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号召诗人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创作“大众化的诗”。为了落实《讲话》精神,大批文艺工作者开始向民间文艺学习,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新的采风运动(对新老民间歌谣进行搜集、整理、加工)。如李季收集了 2000多首民歌,编成《顺天游》;严辰收集了 1000多首民歌,编成了《信天游选》;田间编选了《民歌杂抄》。在这之中,完成了对诗和人的改造。“改造”的直接结果,是使新诗创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间歌谣资源成为发展新诗的主要(以至惟一)资源,“诗的歌谣化”成为新诗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地理位置和接受对象的接受水平看,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是新诗面对特定区域内特定读者的一种最佳选择。从地理位置看,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大都依附于贫瘠偏僻的黄土地。那里经济十分落后,交通极为不便,信息不灵,似乎缺少“现代”应有的气息。但唯有如此,解放区才得以在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顽强生存。不可否认,在那里,激进的政治及其体制与落后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一个令人不可漠视的客观存在。因此,处于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走入最适合它的轨道,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文学也就必然打上了其鲜明的烙印。一方面,时代呼唤文学充分发挥其强烈的宣传、教化功能,为民族的、阶级的解放发挥其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面对落后的接受对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和半文盲群体,文学家为了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就不得不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水平。这样,为工农兵写成就成为诗人们惟一的选择。

从作家素质看,民歌体叙事长诗是 40年代解放区诗人们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解放区的作家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四面八方千方百计投奔而来的知识青年。比较而言,这一类作家由于来自现代气息相对而言较浓厚的都市,经受过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的武装和洗礼,文化素质较高,但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与工农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

离,他们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对他们而言,要想汇入40年代解放区工农兵文学主潮之中,就必须首先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他们之中,有的在改造中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有的则在痛苦的改造中获得新生。即便如此,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一般都出现较晚。

而真正主宰解放区文学的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工农兵作家。这类作家的文化素质一般普遍偏低,大多是中专以下学历,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有限,古典文学根基并不厚实,而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占20世纪文学主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知之甚少,并且还存在着一种拒绝接纳的集体意识。这就内在决定了解放区文学无法获得与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相通的品性。

与其他作家相比,他们固然有着无法克服的缺点和无法弥补的不足,但他们也有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优势:他们与民间资源比较接近。从他们早年的经历看,贫穷的生活使他们从小就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李季从小就是家乡南阳一带广为流行,深为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曲子戏、说唱鼓儿词的忠实观众。每次说唱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他还痴呆地站着不肯离去,等到太阳拉长了他的身影,父亲从背后揪住了他的耳朵,他才懒懒的回到家里吃饭”[1](P550)。这种民间艺术的熏陶,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培养了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

著名诗人阮章竞也是如此,他刚记事时,就在乡下老祖母身边学儿歌。稍大就学歌谣,每逢年关、元宵佳节,他常常“跟在扛着木制龙舟和纸扎的大鲤鱼、敲着锣鼓的艺人后面,学《龙舟歌》《鲤鱼歌》……”[2]

从他们后来的生活经历看,他们一直是作为解放区工农兵中的普通一员,长时期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长时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和兴趣爱好。他们在了解和描写农民群众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研究着人们群众乐于接受且易于接受的艺术。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他们从民间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尤其是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他们在民间艺术那里获得了认同,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式。

从审美情趣看,40年代民歌体叙事长诗是充

分照顾农民欣赏习惯的必然结果。我国民间历来就有说唱文学的传统,如数来宝、鼓书、快板书之类,往往在叙事中带上抒情成分。农民群众对这种有故事性的说唱文学形式是比较喜欢的。

在整个解放区文学中,最了解农民欣赏习惯的是作为解放区文学标志的赵树理。他曾明确指出:“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的买卖。”[3](P1398-1399)

赵树理准确地把握住了“群众爱听故事”的欣赏习惯,也道出了整个解放区作家尤其是工农兵作家共同的心声。为了尊重和照顾群众爱听故事的习惯,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大都叙述一个情节曲折、波澜起伏的完整故事。《王贵与李香香》写一对青年争取革命和恋爱双重胜利的故事。《漳河水》真实地反映了太行山区三个劳动妇女在野蛮封建习俗下的痛苦遭遇和不幸命运,以及她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获得新生的过程。总的说来,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充满乐观精神和悲壮情调。乐观主义来自于作品所表现的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后的喜悦心情,悲壮情调则来自于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艰难历程。

为了照顾农民喜欢说唱艺术的审美情趣,40年代民歌体叙事长诗的作者们,大都对解放区农村长期广为流传的民歌、戏曲等民间文学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搜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传统,而《漳河水》则明显受到了太行山地区许多民歌、小曲的影响。

著名诗人李季曾这样说到他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听到陕北人民自己的创造——顺天游时的内心感受: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背着背包,悄然跟在骑驴赶骡的脚户们的队列之后,傍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城,行走在黄沙连天的运盐道上,拉开尖细拖长的声调,他们时高时低地唱着‘顺天游’,那轻松明朗的调子,真会使你忘记了你是在走路。有时,定会使你觉得自己简直变成了一只飞鸟……另外,在那些晴朗的日子里,你隐身在一丛深绿的沙柳背后,听着那些一边掏着野菜,一边唱歌的农村妇女们纵情歌唱,或者,你悄悄地站在农家小屋的窗口

外边,听着那些盘坐在炕上,手中做着针线的妇女们的独唱或对唱。这时,她们大多是用‘信天游’的调子,哀怨缠绵地编唱对自己爱人的思念,只有在这时候,你才会知道,记载成文字的‘顺天游’,它是已经失去了多少倍的光彩了。

一次,一个乡干部的老婆,给我唱她所记得的‘顺天游’,我是边听边记,当我听到:

三姓庄外沔麻坑

沔烂生铁沔不烂妹的人!

这时,我简直被这单纯而深刻的诗句惊呆了,执着笔我好久好久呆望着她! ……” [4](P455- 456)

李季的这种“震动”,其实在解放区许多作家身上都曾有过,惟有对民间文艺形式的痴迷,才可能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

[参 考 文 献]

- [1] 徐 翔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四) [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 [2] 李季.漫忆咿呀学语时 [J].文艺研究, 1989, (2).
- [3] 赵树理文集: (四) [M].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 [4] 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A Study on the Folk Song Style and Narrative Long Poems in the Liberated Area in 1940s

JIANG Sheng- 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ogan University, Xiaogan, Hubei 432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ing of the folk song style and narrative long poetic tides in the liberated area in 1940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emerging of this kind of poetic tides was both the literary continuation and the inevitable outcome by the guiding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nherently decided by the acceptive levels and interest of the targets of the acceptances and the writers’ qualities. It was the very synthesis of all those factors of the folk song style and narrative long poems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liberated area.

Key Words 1940s; the liberated area; folk song style; narrative long poems